

世人瞩目的六普：轨迹、解读与思考

《人口研究》编辑部

主持人：陆杰华

引言

众所周知，与建国后历次人口普查相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超乎寻常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究其原因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是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人口大国，全球关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中国；同样也关注地球在即将进入70亿人口的关口前，经过数十年人口控制大国的人口现状及未来走势。其二，长期以来，国人一直将人口视作国情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快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的进程中，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中国人口轨迹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人口基本国情有什么新的特点？其三，人口普查数据已成为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基础数据。毋庸置疑，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次普查得到的人口规模、人口性别年龄构成、人口地区分布以及民族、就业、教育、迁移流动、婚姻生育、城镇化、居住环境等方面的翔实数据，将为有效实施“十二五”规划提供权威和重要基础依据。其四，新时期人口普查赋予一种新的使命，即人口普查数据还关乎公共政策调整与完善以及构建以人口管理为主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因为，人口普查相关数据资料不仅对于适时有序完善生育政策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对于加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等公共服务，进一步完善户籍、社会保障、就业、民政等社会事业的改革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刚刚颁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快速汇总数据已经昭示着，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现阶段中国人口发展正呈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从事实上看，人口规模增长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低生育水平下降速度更加明显；与此同时，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大的逆转，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加速，人口老龄化速度超过了预期，出生性别比问题愈发凸显，区域人口分布发生了大的变化，人口迁移流动成为影响人口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从深层次上看，我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要素之间也呈现出互动、依赖甚至更加复杂的局面，人口自身发展问题聚集叠加，如何合理利用公共政策解决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人口重大挑战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现实命题。为了通过最新人口普查数据透视中国人口变化轨迹，聚焦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焦点问题，以及思考未来人口发展政策，本论坛特邀请国家人口计生委于学军研究员、南开大学人口所原新教授和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黄荣清教授，专门就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关的人口

规模变化、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专题进行多视角的解读。

我国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的新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于学军(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研究员)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2010 年末我国总人口约为 13.4 亿, 仍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9.4%。但是, 人口增长速度下降明显, 年平均增长率从 1990~2000 年的 10.7‰ 下降到 2000~2010 年的 5.7‰; 净增人口进一步减少, 从 1990~2000 年均每年的 1279 万人减少到 2000~2010 年的 739 万人。我国人口增长速度的新趋势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事关我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应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给予重视, 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1 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变化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 死亡率迅速下降, 而出生率则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使得人口快速增长, 形成了 1949~1958 年的第一次增长高峰和 1962~1975 年的第二次增长高峰。在第一次增长高峰期间, 平均每年净增 1221 万; 而在第二次增长高峰期间, 平均每年净增高达 1947 万人。相应地, 人口规模从 1949 年的 5.4 亿增加到 1981 年的 10 亿, 面临巨大的新增人口的压力。一是少儿人口对教育的压力, 二是年轻人口对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压力, 三是满足新增人口的刚性消费对资本积累的制约。这一阶段, 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处在“劣性均衡陷阱”中, 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很大。从人口问题的角度看,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困难的时期。

1970 年代初, 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快速人口增长的势头很快得到遏制。人口出生率从 1970 年的 33‰ 下降到 1980 年的 18‰, 10 年间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 一举奠定了人口转变的基础, 也开启了“人口红利期”的窗口。这一时期, 平均每年净增 1523 万人, 大大减轻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虽然受经济体制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 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增长高峰的周期性影响, 1981~1990 年间, 人口增长率有所回升, 形成了第三次人口增长高峰。但与前两次人口增长高峰相比, 这次人口增长高峰的波动幅度不大。这期间, 平均每年净增 1587 万人, 大致与 1970 年代持平, 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明显的冲击。1992 年, 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人口增长的动力出现“拐点”, 开始进入惯性增长时期。1998 年, 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 10‰ 以下, 标志着人口转变基本完成。1990~2000 年间, 平均每年净增 1279 万人, 人口负担进一步减轻, 形成了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

进入 21 世纪后, 我国人口规模继续扩大, 但增长惯性明显减弱。这一时期, 我国总人口中劳动力比重处在最高峰, 人口负担系数达到了最低点, 人口处在最有活力的时期, 是最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时机。在良好的人口环境下, 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2000 年的 1000 美元以下, 提高到 2010 年的 4000 美元以上, 跨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 人口规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内涵上发生了变化。在人口转变的初期, 特别是 1949~1975 年间, 多数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居 20‰~30‰, 人口规模压力的主要表现是每年新增的经济成果很大一部分要用于满足不断扩大的人口规模对基本生活消费的需求, 妨碍了生产要素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目前, 满足基本居民生活消费的生产能力已经不成问题, 问题是随着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人口规模的压力逐步转向对资源

和环境的压力。

2 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的新趋势

1970 年代,随着世界人口转变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的生育率纷纷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人们开始关注人口增长下降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对经济增长可能带来影响。发达国家人口已经低速增长多年,但出现零增长的国家为数不多。目前人口零增长主要发生在东欧和南欧。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仍将继续低速增长,而我国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时在 2030 年前后出现负增长。当然,我国人口何时出现零增长、峰值是多少、零增长后的人口形态如何则取决于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以及人口发展战略选择和相应的政策取向。从目前几个影响人口规模的要素看,人口零增长到来的时点或许比以往预期要早。

一是育龄妇女人口规模即将达到峰值。由于第二次人口增长高峰时出生的妇女即将退出育龄期,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80 后”、“90 后”人口成为生育旺盛期的主体,育龄妇女总量在“十二五”时期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下降。其中 20~29 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将从 2011 年的 1.08 亿下降到 2020 年的 0.85 亿,平均每年将减少 200 万人以上。在同样的生育水平下,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减少意味着出生人口的减少。

二是生育水平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按照国家统计局年度公报的出生人口数推算,近几年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65 左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特别是城镇化的进程将进一步促进人们婚育观念发生变化,实际生育水平会逐步接近政策生育水平。在育龄人口略有增加的情况下,“十一五”出生人口比“十五”时期略有减少,表明我国生育水平总体上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

三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速度。人口自然增长既受出生率影响,也受死亡率影响。一方面,我国人口出生率从 1999 年的 15.23‰ 下降到 2009 年的 12.13‰;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自 1976 年后一直保持在 7‰ 以下的人口死亡率在 2008 年首次回升至 7‰ 以上,年死亡人口从 1999 年的 810 万人增加到 2009 年的 943 万人。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人口自然增长率从 1999 年的 8.77‰ 下降至 2009 年的 5.05‰。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2030 年前后我国将出现人口零增长,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人口增量将越来越小,走向零增长的步伐正在加快。今后人口规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多是人口存量及其内部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而净增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人均指标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减小。在世界人口仍将继续增长 30 亿的形势下,如果我国过早地出现人口零增长现象,既不利于人口均衡发展,也将影响国际竞争的人口条件。人口规模从膨胀到萎缩,必将引发一系列的人口变化,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新一轮的影响,带来一系列结构调整和重新适应问题。因此,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及时做出战略调整和政策反应十分必要。

3 几点思考

在联合国《2010 年世界人口展望》所统计的 230 个国家或地区中,人口超过 0.4 亿的有 34 个,其中 1 亿以上的有 11 个。我国人口规模大约相当于那些人口少于 0.4 亿的 19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和,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且是超级人口大国。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面对和承受着规模庞大的人口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对于如何应对人口增长已经有了很多办法,而对趋近零增长的人口发展,对人口减少所带来的问题还不太适应。在此,仅就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的新变化,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人口规模与综合国力。从一般的发展规律看,人口规模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是不同的。在生产力不发达时期,劳动力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人口规模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国力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在工业化时期,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人手”,人口规模的大小与综合国力不一定成正比,人口大国不意味着综合国力强大;而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带来的技术、知识、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人口素质与结构是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知识传播速度的加快、科学技术共享程度的加深以及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各国生产力水平逐步趋同,劳动力资源趋于“同质”,一个国家或地区占世界人口比例与综合国力的关系再次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人口高速增长与低速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人口高速增长后,都要逐步完成人口转变的过程,先是孩子的减少,而后是劳动力的减少,最后进入老龄化的常态社会。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人口规模曾经高速增长,从5.4亿增加到13.4亿。在巨大的人口规模压力下,我国应对措施得当,不但实现了人口转变,而且创造了世界经济的中国奇迹。犹如恐惧“人口爆炸”一样,面对趋近零增长的人口发展,新的担忧再次出现。我认为,这种担忧十分必要,但担忧的不仅是人口规模的压力,更主要的是,在未来几十年内,在继续承受巨大人口规模压力的同时,人口的低速增长会带来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包括人口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等等,将成为影响我国从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低速人口增长也没那么可怕。发达国家人口低速增长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出现严重衰退,而是稳定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事实上,许多人口现象是中性的,比如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红利期,利用好了就是机遇,而处理不好就是挑战。因此,人口零增长只是人口转变的继续,是人口发展的一个过程,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如何适应。

第三,人口低速增长与经济增长动力。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人口高速增长问题,而发达国家则要应对人口低速增长带来的影响。在低速人口增长条件下,人们最担心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从一般的发展规律看,在低速增长的人口环境中,很难看到高速增长的现象,只有中国是个例外。我国虽然处于人口低速增长状态,但人口数量大,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城乡发展不平衡可以使我国经济发展形成区域互动的发展模块,产业可以进行不同层次和梯度的转移,回旋的余地大。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人口走向零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逐步减慢。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过程,向人口素质要红利,再造人口资源新的比较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同时,我们可以利用人口流动和迁移产生投资和消费的机会,向人口城镇化要红利,弥补人口低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四,规模结构矛盾与人口均衡发展。我国今后将长期面对人口规模庞大,但增长速度很低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结构和分布将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我们既要承受人口规模的巨大压力,也要面对复杂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我认为,应对规模压力和结构矛盾的关键是要逐步完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按照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发展前景的预测,如果目前总和生育率1.64保持不变,总人口峰值为14.1亿;而将总和生育率从2010年的1.64逐步提高到2030年的更替水平,总人口的峰值为14.8亿,比生育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7000万人。从近期看,会使人口压力有所增加,但是从长期看,这部分人口将有助于人口均衡发展和家庭功能稳定,也有助于缓解低速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因此,在低速人口增长的形势下,要转变调控人口的思路和方法来应对人口规模压力问题,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根本途径”。

总之,在过去 30 多年,我国很好地解决了人口规模的压力问题,并充分抓住用好人口资源的比较优势,保持了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未来几十年,在人口低速增长新趋势下,我国人口发展形态将发生巨大变化,进而对经济社会产生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如果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充分考虑人口因素的新变化,因势利导,再造新的人口资源比较优势,会极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跃上一个新台阶。因此,把人口发展战略作为最基础的战略,采取一揽子的措施,逐步完善人口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的新变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人口老龄化新变化及其经济社会挑战

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国家统计局 2011),我国的老年人口(60 岁及以上)总量增至 1.78 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 13.26%,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15~59 岁)规模扩大到 9.40 亿,达到峰值,劳动力资源供给最为丰富,占总人口比重高达 70.14%;少年儿童人口数量进一步缩减为 2.22 亿,只占总人口的 16.60%。这显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处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最大的时刻,也是人口红利提供最大的时刻。预期未来的人口变动将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递减和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为主要特征,将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1 人口发展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时刻

回顾历史,我国经过 30 多年的全面改革开放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展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第一,完成了人口转变,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死亡率水平就一直稳定在 6‰~7‰的低水平上,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自 1990 年代末期分别降到 15‰和 10‰以下,在不断的缓慢下降,目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 5‰,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

第二,实现了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以总和生育率达到并低于更替水平为低生育水平标准,我国人口则在 1990 年代初期就已经步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从那时起,生育率水平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缓慢下滑,至今已经持续了约 19 年的低生育率,官方公布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变动在 1.7 上下。

第三,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中“控制人口数量”的任务基本实现,主要表现在年出生人口和年净增人口规模减少,目前的年出生人口规模约为 1600 万人,年净增人口为 600~650 万人,与 1990 年代比较,年出生人口数量减少 1/3,年净增人口规模缩减 1/2,人口快速增长势头被有效遏制,未来总人口将以年增量递减的方式继续增加。

上述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数量的变化同样也带来了人口结构性变化。一是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双降,0~14 岁少年儿童人口规模最大时出现在 1980 年代早期,达到 3.39 亿人,现在减少到 2.22 亿人;与半个世纪以前比较,我国总人口规模扩大了 1 倍,少年儿童人口数量一增一减,从年均增长 2.46%到年均减少 2.64%,人口数量又回到初始规模,但是占总人口的比重却从 40%降至 16.6%,说明我国的确有效控制了人口快速增长势头。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扩大,从 3.34 亿增加到 9.40 亿,扩大了 1.8 倍,劳动力资源供给达到峰值,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70%以

上。三是老年人口数量从 0.45 亿增加到 1.78 亿,扩大 3 倍,而且年均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是总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尽管如此,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还不算太高。

表 1 历次人口普查各年龄组人口及其年均增长率

Table 1 Population Siz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Their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Base on Census Years

年份	人口数(万人)				年均增长率(%)			
	总人口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总人口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1953	59435	21563	33379	4493				
1964	69458	28262	36347	4848	1.42	2.46	0.77	0.69
1982	100818	33865	59261	7692	2.07	1.00	2.72	2.56
1990	113368	31392	72238	9738	1.47	-0.95	2.48	2.95
2000	126583	28975	84557	13051	1.10	-0.80	1.57	2.93
2010	133972	22246	93962	17764	0.57	-2.64	1.05	3.08

资料来源: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综上判断,我国目前处在人口年龄结构负担最小、劳动力供给最充分的人口结构的最佳时期。居安思危,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我国致力于控制人口数量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按照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已经开始日渐显现,人口数量变化与人口结构演变相互交织,展现出一幅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景象,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不可逆转的人口常态现象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结果之一,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的人口后果。我国的特殊性在于老年人口规模空前,进展速度奇快。

(1)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过去半个世纪,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但是,老龄化程度进展缓慢。目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达到 1.78 亿,是半个世纪以前老年人口数量的 3 倍,但是,人口老龄化水平仅从 7.6% 升至 13.3%;未来半个世纪,老年人口数量和人口老龄化水平同步快速推进,到 2050 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 4.4 亿,比现在再增加 1.5 倍,而人口老龄化快速进展,达到 31.1%^①。在老年人口规模上,我国是目前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我国老年人口将在目前 1.78 亿的基础上持续快速扩大,2014 年超过 2 亿,2025 年达到 3 亿,2034 年超越 4 亿,约 10 年增加 1 亿老年人口,2050 年达到 4.4 亿,比届时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总和约 5000 万人,比印度老年人口多 1 亿人左右,比美国总人口多约 5000 万人。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在各年龄段人口增长速度和总人口增长速度中是最快的,因为我们必须承受 1950 年代、1962~1974 年和 1980 年代三次生育高峰出生队列步入老龄的惯性冲击,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我国是世界第一老年人口大国的位置将一直保持到本世纪 80 年代。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上,我国在 1999 年进入老龄社会的同时,也启动了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步伐,人口老龄化水平从 1999 年的 10% 增长到 2020 年的 16.7%。之后,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速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水平从 2020 年 16.7% 快速提升到 2030 年 23.4%,2045~2050 年间达到 30% 以上,进入重度老龄化的平台期。换言之,1999 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1/10,目前为 1/8,2020 年为 1/6,2025 年为 1/5,2030 年为 1/4,2050 年达到约 1/3。人口老龄化水

① 文中 2010 年以后的人口预测数据均引自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p>.

平从 10% 提高到 30% ,我国仅用 47 年时间 ,而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要用 100 年左右 ,甚至更长的时间;除日本外 ,这个速度是人口大国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作广泛深入的调整。

(2) 人口老龄化现象前所未有。人口老龄化进程是伴随着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减少而实现的。1953 年 ,我国老年人口为 0.45 亿人 ,只是 0~14 岁少年儿童人口的 1/5;目前 ,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到 1.78 亿人 ,相当于少年儿童人口的 4/5;2023 年 ,老年人口数量和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基本相等 ,均为 2.6 亿左右;本世纪中叶 ,老年人口规模达到 4.4 亿 ,将超过少年儿童人口数量 1 倍以上。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总人口中的老少人口关系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传统上拥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年轻型人口类型将彻底消失。而这种巨大变动恰恰发生在我国社会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重大转型过程中 ,发生在我国经济社会融入全球市场和全球文化的过程中 ,传统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文化习俗都将伴随人口结构转变发生剧烈冲击。

表 2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过去和未来

Table 2 Trend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in China: 1953 - 2050

年份	人口总数 (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年龄中位数 (岁)
		0~14 岁	15~59 岁	60 岁及以上	
1953	5.94	36.3	56.2	7.6	21.7
1964	6.95	40.7	52.3	7.0	19.4
1982	10.08	33.6	58.8	7.6	22.9
1990	11.34	27.7	63.7	8.6	25.3
2000	12.66	22.9	66.8	10.3	30.3
2010	13.40	16.6	70.1	13.3	-
2015	13.96	19.0	66.2	14.8	35.6
2020	14.31	18.7	64.5	16.7	37.1
2025	14.53	18.1	62.3	19.6	38.9
2030	14.62	16.9	59.7	23.4	41.1
2035	14.62	15.8	57.8	26.4	42.8
2040	14.55	15.3	57.2	27.5	44.1
2045	14.40	15.3	56.0	28.7	44.9
2050	14.17	15.3	53.7	31.1	45.2

资料来源: 1953~2010 年数据为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2015~2050 年数据为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p>.

(3) 人口老龄化影响着每一个人生活。我国人口老龄化激增和老年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是在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的背景下实现的 ,人口老龄化不单纯影响老年人 ,而是影响全体公民 ,包括每一个男人、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普遍现象。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数量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而稳步增多 ,直接影响世代间和世代内的代际关系和代际稳定。第一 ,人口总体上变得越来越老 ,人口年龄中位数从半个世纪以前的 20 岁上下增加到现在约 34 岁 ,本世纪中叶将达到 45 岁以上 ,即总人口从半数以上不足 20 岁增加到半数以上超过 45 岁 ,直接影响人口的活力。第二 ,劳动力资源规模出现拐点 ,现在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最大的时期 ,为 9.4 亿人 ,之后 ,将由快速增加转变为缓慢减少 ,但是 2025 年以前依然在 9 亿以上 ,直到 2045 年还有 8 亿以上 ,

世纪中期减至 7.6 亿,比现在缩减 1/5。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激增的强烈反差,导致潜在抚养比(potential support ratio,即每个 60 岁及以上老人平均有多少个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正在并且继续下跌。在 1950~2010 年间,潜在抚养比由 7.4 减少到 5.6,预计 2050 年进一步降至 1.7。第三,伴随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力资源在不断老化。劳动年龄人口中的 15~39 岁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日益减少,40~59 岁年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增加,二者的比例关系目前为 59:41,2025 年变为 54:46,2050 年进一步转变为 53:47。劳动力资源规模、劳动力资源结构和人口潜在抚养比的变化,决定了我国将长期面临劳动就业的压力,同时,社会养老福利体系,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养老保险计划等改革与完善任重道远。

3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人口现象,不是人口问题,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现象不相适应的时候,才会引发社会经济问题。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重大的后果和效应,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老年保障、税收及代际资源配置产生冲击;在社会层面,人口老龄化必然影响医疗卫生、健康保健和长期照料服务、家庭结构及其成员关系、生活安排、住房与迁移等。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在人口老龄化的大潮到来之时,国家还处在发展中阶段,离富裕还有较大的距离,而且,缺乏足够的时间建立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

(1) 社会领域挑战“未备先老”。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已经是一个严峻的客观现实。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是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养老、医疗、长期照料等一系列问题是在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同步爆发的,解决起来不仅没有足够的时间,而且这些问题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在整体上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压力有一个放大效应。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制度建设的滞后和社会公共政策的不足,与经济改革的成功和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社会发展方面,特别是事关民生的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步履蹒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农村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更是严重滞后,特别是为老社会服务制度尚在起步阶段。面对急速的人口老龄化,无论是养老、医疗,还是长期照料服务和公共资源分配等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体系,还处在“未备先老”状态,解决不好,将会危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确立的社会发展的近期目标;建立和谐社会和现代化社会是我国的长远目标,所有这些必须建立在老龄社会不断加剧的基本国情之上,老龄意识主流化和不分年龄人人平等是促进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 经济领域挑战“未富先老”。“未富先老”是我国老龄社会的显著特征,也是一个基本国情。一是,经济实力还不雄厚。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99 年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刚刚实现小康,人均 GDP 为 840 美元,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6,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 GDP 也只有世界平均值的一半略多。目前,虽然已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我们还不是经济强国,人均 GDP 为 4385 美元,依然排名世界第 95 位,只是日本的人均 GDP 的 1/10 和美国人均 GDP 的 1/11,人均 GDP 值与这两个国家相差至少 100 年,仍属于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应对老龄社会的经济能力还比较低。二是,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1999 年我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综合反映社会发展

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为0.567,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升至0.663,是自1970年以来世界人类发展指数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位居“进步最快的前10个国家”第二位。尽管如此,我国人类发展指数仍然排世界第89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三是,社会公平亟待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二者相差13190元,差距为3.2倍。我国10%的最低收入人口只分享社会总收入的1.8%,而10%的最高收入人口却占社会总收入的33.1%,二者相差18.4倍,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目前超过0.5,收入不平等在增加,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0.4的社会安全警戒线。我国应对老龄社会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未富先老”是一个预警,警示社会在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人口迅速转变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潜伏着危机;其积极的政策意义在于警示政府应该及早在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上做好准备。

(3) 农村首先经受人□老龄化大潮的冲击。理论上,我国农村人口生育率水平比城市高,平均预期寿命比城市低,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应该比城镇低,现实中却恰恰相反。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均高于城镇,目前,农村老龄化水平为14.2%,比城镇高3.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城镇化水平滞后总人口城镇化水平,我国目前总人口城镇化水平为49.68%,但是老年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只有不足40%,老年人口城镇化水平过半的时间至少比总人口要迟10年左右。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的原因是我国有大量流动人口,按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规模约为2.21亿^①,流动人口的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绝大多数进入城镇、绝大多数为劳动年龄人口,因此改变了城乡的人口老龄化态势。流动人口加剧了农村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程度,同时增加了农村老龄问题的复杂性,如留守老人、留守空巢老人、留守隔代家庭、留守儿童和妇女等,把农村推向人口老龄化大潮的前沿,而农村恰恰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的地区,这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4) 创造了人口抚养比最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一方面,人口快速转变为我国创造了总抚养比处在低谷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大约到2030年前结束。另一方面,总抚养比下降会在多方面改变经济行为并加速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由于家庭需要养育的孩子变得更少,成人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教育、培训和劳动参与率会随之提高。劳动年龄阶段的高储蓄特征会促进储蓄提高。更小的家庭规模和提高的预期寿命,又会激励父母为提高孩子的“质量”(即未来的劳动力)而投资,从而提升人力资本,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这就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机理,人口红利又为促进经济发展打开了机会窗口,人口机会窗口为构建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和老年服务体系创造了绝佳的战略机遇。回顾历史,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英国、瑞典、丹麦、挪威、日本、新加坡等,社会养老福利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均充分利用了各自的人口机会窗口期。东亚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转变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就是上述理论在实践中的最好范例。从1975年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东亚国家的总抚养比从114降低到了56,是世界上任何地区都不曾达到的降幅,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47%升至64%,研究表明1975年以来东亚人均GDP增长中有1/4~2/5受益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东亚有效利用人口红利的成功经验在于,政府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税收制度、管理体制、对法律规则的规范,以及政府在基础建设、研发和人力资本方面的巨大投资。人口结构的转变只是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要充分认识到人口红利的益处是不会永远持续,他是一次性的机会,能否把机会变为现实优势,要看社会是否可以组织经济资源并将资源有效的配置

^① 这一数据不包括市内人户分离的约4000万人。

到增值经济活动中。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具有双面性,要客观的和一分为二的认识。例如,我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老年人口,但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我国虽然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年龄负担最轻的国家之一;我国虽然处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但也处于经济长期稳定高速增长时期;我国虽然进入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很快的时期,但也是物质财富和政府财政收入以更高速度增长的时期。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更增加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要趋利避害,充分利用难得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备战人口老龄化更加严峻挑战。

人口流动:从排斥到接受,变流动为定居

黄荣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教授)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大陆31个地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如果把这部分人称为流动人口)为2.61亿人,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44亿人,与10年前相比,增长了81.03%。由于人口普查的详细结果尚未完全公布,我们尚不知道人口流动的细节,但从两次普查中各地区人口增长情况,我们也能大致估计人口的流向。从人口绝对数看,人口增加最多的是广东省,其次是浙江、上海和北京。而湖北、四川、重庆和贵州的人口是负增长。从人口增加率来看,从高到低依次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贵州、四川、湖北和重庆。因为人口增加率中扣除自然增加率就是净迁入率,而北京、上海、天津这三大直辖市的自然增加率已接近零或负增长,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流动人口最多的是广东省,其次是浙江、上海等,流入率最高的是北京、上海等,人口流向主要是东部沿海,特别是被称作三大经济圈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流出人口最多的是重庆、湖北、四川,流出率最高的为重庆、湖北、四川、贵州。人口流出地区主要是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

与2000年相比,我国城镇人口的数量大幅上升。10年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6.86%上升至50.32%,上升幅度达13.46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由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原来属于乡村区域的地方改变为城镇区域,引起了城镇人口的增加,但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乡村人口流入城镇的结果。我国乡村人口比重降低,城镇人口比重大幅增加,反映了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向是从农村到城市的特征。2.16亿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占了全国人口近1/5!这个数字反映的是有大量的人口在城市而户籍又不在城市的现实。

1 人口流动,从排斥到接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从中西部到东部、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流动,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资源在市场作用下,分布逐趋合理,配置不断优化的表现,是工业化、城市化中必然出现的现象。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人们对人口流动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所谓计划经济,社会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都必须按计划组织和管理。所以,计划经济要顺利运行,从本质上说它是排斥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不受控制而自由流动的。因为既然是自由流动,它不在预期内,就无法按对社会生产进行有效控制,就会打乱计划。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1949年9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1954年的宪法中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但在1953年开始,中央政府的政务院就发布了文件《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开始有“盲目流动”(简称“盲流”)这个词。从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立场来看,因为这些农民进城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是“盲目”的。当然以今天

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农民是为了获得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过更好的生活而进城,是有“理性”的行动,并非盲目的。但“盲流”这个词,从此以后在我国沿用了几十年。为了制止盲流,国家从1953年起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把粮、棉、油等基本生活资料纳入计划经济范畴。1956年全国基本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农村土地作为生产资料,不再归个人所有,而是归集体所有。1957年全国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全国实行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这样,在经济上形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行政上对各种区域按市、镇、乡村进行划分,把人口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区分,非农业户口的人由国家计划安排商品粮供应。政府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分割的两元户籍管理制度,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在一段时期,人们到外地去,吃饭要粮票,住宿需要大队、公社的证明;所以,人们的自由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有居住和迁徙”条文,早已名存实亡。所以,到1975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取消了这一条款(至今也没有恢复)时,它已经成了人们只能接受的事实。

流动人口的大量涌现,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首先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使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吃饭问题,到上世纪80年代末,终于取消了粮食和副食品按人口的定量供应。但农业生产率提高,也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加。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决定了人口流向。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导致了城乡居民在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发展机会等巨大差异。另外,由于区位和资源禀赋、历史和政策因素等叠加和共同作用下,我国各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最明显地就是东部沿海,特别是三大经济圈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流动的人口目的是为了获得发展机会,取得较高的收入、分享更好的社会服务,决定了这些地区聚集了最多的流动人口。

大量的流动人口存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两头对外”的赶超发展战略,一方面积极地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同时利用国内劳动力价格低的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产品面向国际市场,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现在,中国生产的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产量,如钢铁、水泥等,已经位居世界第一。而制造业工作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不仅如此,城市中那些收入低、脏、累和危险的工作,实际上大多由农民工来承担。所以说,流动人口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无论是从制度调整上,人的认识上转变都有个过程,所以在一段时间,人们对人口流动的作用没有被正确认识,对流动人口不能公正地对待。以传统的经济思维模式,把不符合预期的人口流动称作“盲目无序”,要劝阻或通过所谓对“三无”人员收容和遣送。同时,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采取本地就业优先等种种办法设置障碍,目的就是流动人口进行控制。但城市化,人口流动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实际上已势不可挡。

流动人口越来越庞大,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社会对此也越来越关注。近年来,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建设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国的主旋律,政府也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寓服务于管理,从切实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等各方面的权益着手,并进而考虑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市民化”方针政策。从2004~2010年,中共中央每一年的1号文件都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其文件内容都涉及到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农民进城问题,其目标是消除二元结构,推进城市化,构筑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的社会。人口的自由流动,从限制、排斥到接受,是公民正当权利的回归,体现了我国社会的重大进步。

2 人口流动到城市定居

2.61 亿流动人口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同时按照“六普”的定义,常住人口包括了“住本户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和“住本户不满半年、户口在外乡、镇、街道,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对比这两个定义可以知道,流动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常住人口,即已经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或虽然在当地居住不满半年,但已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即是说,实际上他们已经定居,不流动了,不过是由于户口的原因,把他们归入流动人口罢了。

从统计数据来看,流动人口数逐年增加,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些数字中,既有历年累积,又有每年新增的。这说明,流动人口到城市,没有户籍的人越积越多。安居才能乐业,解决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主要应该是城市的安居问题,应该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但是,从流动人口到城市定居存在着城市能不能接纳,农民肯不肯进入的问题。

对政府而言,大量的流动人口存在,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也增加了管理成本,不利于城市发展。每年的春运总要出现全国人口的大移动,是社会财富的浪费。劳动力流动性太大,不利于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所以,政府也一直在探索户籍制度的改革,使流动人口能在城市定居下来,早在 1997 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1997]20 号)文件中已提出“允许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常住人口”2000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则明确指出,“从 2000 年起,凡在县级市区、县级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县以下小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固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不得实行歧视性政策”。在 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 1 号文件中提出“推进城镇化的制度创新……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显然,中小城市对农民的壁垒,已徐徐拆除。但据一些调查表明,中小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似乎并不大。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市民的许多福利都已经被剥离,例如,就业、住房都已市场化,但如果改变户口性质,则要放弃宅基地、承包地,有些“得不偿失”,把农业户口换成当地市民户口,农民认为“意义不大”。而对于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已经使这些城市不堪重负,即使如郑州、石家庄这样的二线城市,户口的完全开放,目前也是不可行的。郑州市在 2003 年宣布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但一年之后却以“暂缓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压力”为由“急刹车”,原因是城市公共服务的资源无法满足人口的迅速大量增加,城市功能和次序被搅乱,以中、小学为例,一个教室挤满了七、八十名学生,正常教育次序被打乱,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原市民的利益。

对流动人口而言,虽然,政府文件在就业、职业培训,子女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规定了农民工的权利,但在实际中,尚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壁垒,而申请最低生活保障、购买经济适用房、申请廉租房等还是需要当地户口,所以,若取得居住地的城市户籍,无疑会给他们工作、生活带来许多方便。如果要他们放弃农业户口,就意味着要放弃难于割舍的土地,尤其是这些土地(承包地、宅基地)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财产,放弃原有的社会资源,放弃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且农民自己无论是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都存在不足,要他们投身于竞争激烈、充满风险的城市社会中,他们在决策时不能不踌躇。

综上所述,解决流动人口到城市定居的问题,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取决于国家的发展战略,

需要深化各项改革,进行制度创新。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任何一个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容量都是有限的。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需要改变人口流向过分集中问题。所谓过分集中,即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大城市。为此,需要解决协调、均衡发展的问题,这里说的协调、均衡发展既包括区域之间、也包括城乡和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发展。

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这是因为我国东部沿海同其他区域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总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任其差距的扩大而无动于衷。事实上,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如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从六普数据看,西部大开发的效果是明显的,特别是西北地区。如新疆、青海、宁夏等原来经济比较落后地区,按六普数据推算,都出现了人口净流入。但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效果尚不明显。东北地区工业基础好,自然资源丰富。从历史上看,东北地区一直是人口流入地区。但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的发展滞后于东南沿海地区,因此成了人口净流出地区。中部地区也同样,并且是人口流出最多的地区,俗话说,“中原定,天下安”。当中部地区得到相应的发展,人口流动的总量就可得到控制。全国各区域实现了均衡发展,局部区域的人口压力就会减轻,从总体上说,就会为解决流动人口的定居创造条件。

其次是解决大城市资源过分集中,中小城市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中国最大的资源是政治资源,中国的城市,几乎都是各级政府的政治中心,并且,往往城市越大,中心的级别越高(或者也可反过来说),而中心的级别越高,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最强。由于大城市的资源集中,个人、企业发展的机会就多,也就越倾向于集聚到大城市,这样,大城市也就越来越膨胀。现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都在打造所谓的“世界大都市”,“国际化大都市”,楼盖得越来越高,办公室装修得越来越阔气,汽车越来越豪华。有人把这种现象戏称为“城内是欧洲,城外是非洲”。穷人都想到富裕地区去分一杯羹,这种状况怎么能不导致大城市过度膨胀呢?

按照中央 2010 年 1 号文件的精神,在推进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作为重点,要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成为主要吸纳在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向大城市倾斜的发展思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努力把中小城市打造成充满活力,有发展机会,适宜居住的地方。中小城市成为了吸引流动人口地区,才能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户籍虽然只是一种按住户登记的人口管理制度,但在我国,它被附加了许多权利。与户口性质和登记地挂钩的有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计划生育、财产等权利。并且,时期和地区不同,户口的含金量也大不相同。户口制度改革所以复杂,是因为它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各个利益集团都希望在改革中得利,至少不受损,但这往往很难做到,因此变得错综而复杂。

土地现在也成了农民进城的羁绊。要使农民愿意进城,土地制度改革是重要环节。中国土地制度是非常令人费解的一项制度。按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的土地都是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只有经营权。但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却没有土地的处置权和不能获得土地的增值收益。因为宪法第十条还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即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无权转让和买卖,每一块土地的用途(如农业用地、林地、宅基地)也是有政府(国家的代表)来规定。该条同时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即土地所有制和用途的改变只能以政府“征用”的名义来改变。但严格来说,如果不是公共利益的需要,那么,国家也不能随便征用农民的土地。在实际过程中,是政府先征用土地,然后在“市场”拍卖,由地产商去开发。由拍卖(扣除征用费用)的收入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即土地的增值部分也不归农民。但不管怎么说,土地是资产、财富已经被人认识,并且由于资源有限,可以增值。这样,经济发

达地区,靠近城市地区的农民当然不肯为了已经不那么“值钱”的城市户口(尤其是中小城市),而放弃可得的一笔财富,对偏远地区的农民来说,虽然土地现在还不那么值钱,但有升值空间,则“农业户口”成了“鸡肋”,进城换户口还是进城不换户口成了两难抉择。要让农民进城,变流动为定居,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推进城市化绕不开的门槛。

主持人评论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新世纪中国人口变迁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尽管近日刚刚颁布的人口普查数据仅是快速汇总和一个时点资料,但却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过去中国人口发展的轨迹和预示着未来人口发展的走向。为此,三位专家专门聚焦人口规模变化、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三个方面展开了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他们各自的思考。

针对最新人口普查公布的人口总量数据资料,于学军研究员首先全面回顾了建国之后中国人口规模变化的整个历程及阶段性特点。其实,他在向世人表明,简单的人口规模变化不仅预示着中国人口转变的历程,同时还全视窗反映着人口规模数字变化背后的全方位人口要素变化,包括人口增速及人口结构变化。他认为,人口总量变化反映着综合国力的变化,中国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的新趋势不仅与国际上有着越来越多的趋同特点,同时更值得国人关注的是:我国人口增量将越来越小,走向零增长的步伐正在加快。也正因为如此,于学军研究员特别强调,恰逢中国人口变迁之时,我们应当从事关我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地位的大局出发,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给予重视,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原新教授侧重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重新审视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间中人口老龄化的规律性与特点,他特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的新情况、新特点与新挑战。他指出,我国人口发展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刻,现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结果是以往人口转变的必然产物;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前所未有,将影响着每个人生活。原教授特别强调,人口老龄化不单纯影响老年人,而是影响全体公民,包括每一个男人、妇女、儿童和老人。因此,他提出要客观、科学处理好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挑战,并从前瞻、全局、操作层面上积极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

人口流动是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人口流动速度加快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人口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城市化加快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针对现阶段人口迁移流动和城市化的新形势,黄荣清教授重点从变流动为定居的视角客观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动的演进过程以及影响的各种因素。他一再重申,解决流动人口到城市定居的问题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它取决于国家的发展战略,需要深化各项改革,进行制度创新。黄教授最后思考了影响流动人口定居的各种制度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人口流动从排斥到接受的政策选择。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第六次人口普查快速汇总数据刚刚颁布不久,三位教授就从三个不同的侧面系统梳理了中国人口变迁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轨迹,并从政策调整和完善的角度作出了颇有思考的解读,既反映出学者对人口普查数据的敏感和分析的睿智,同时也体现了学者对人口变化所引发的人口政策调整 and 完善的几分期盼。当然,本主持人认为,上述的分析和讨论还仅仅是初步的,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例如,于学军研究员提出了当今人口规模变化进程中理念转变的重要性,而我们更加期待理念转变的同时,未来人口政策的行动如何付诸实践,完善生育政策的路线图如何制定?原新教授提到的人口老龄化影响着每一个人,我们的关注重点则是老龄化是如何

从宏观上影响到个体侧面,影响机理是什么?黄荣清教授谈到了人口流动从排斥到接受,我们则急盼期待近 1/5 的 2.6 亿流动人口什么时候能够真正不再游离于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城乡户籍改革出路何在?

事实上,第六次人口普查留给学界的分析与思考空间还很大,我们不能仅依靠一次论坛就消除我们对中国人人口发展变迁轨迹的全部疑惑,我们期望更多的学者加入,继续关注最新人口普查所带给世界、中国乃至每一个人的影响。

参考文献/Reference:

- 1 国家统计局.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 1 号). 2011-04-28. <http://www.stats.gov.cn>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 2011. The First Bulletin of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of 2010. April 28. <http://www.stats.gov.cn>

The Eye – Catching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 Characteristics, Explanations and Thoughts

China's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suggests that in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population profile clearly exhibi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ast. On the one hand,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size has been effectively curbed, and fertility has become even lower. Meanwhil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has been changed greatly: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under age 15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has dropped fast, while the pace of population aging has been faster than expected. Moreover, the problem of sex ratio at birth has become even more severe,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has largely reshaped. Migr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these chang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clear that China's population profile has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than earlier years, and population size, quality,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are interrelated, intertwined and interdependent. These present challenges to th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how to reformulate public policies to solve population-related issues currently and in the future.

This forum invites Xuejun Yu from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P. R. China, Xin Yuan from Nankai University, and Rongqing Huang from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ie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to discuss aforementioned important issue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utilizing the latest population census data. They examine the trajectory of population chang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population size,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future population policy.

(责任编辑: 沈 铭 石 玲 收稿时间: 2011-05)